

July 2016

Toward the Future: A New Interpretation to Liang Qichao's *The Future of New China*

Liyuan Jia

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 <https://tsla.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



Part of the [Chinese Studies Commons](#)

Recommended Citation

Jia, Liyuan. 2016. "Toward the Future: A New Interpretation to Liang Qichao's *The Future of New China*."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36, (4): pp.69-75. <https://tsla.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vol36/iss4/23>

This Research Article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by an authorized editor of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向着“未来”前进

——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新解

贾立元

摘要：本文通过对《新中国未来记》(1902)的细读，分析其中正文与批注之间的时态对话关系，以说明作品既非单纯地叙述“未来”，亦非仅仅评论“现在”，而是在两者之间往复运动，由此构成其根本性的叙事特征。此外，通过考察其中此前未被关注过的多处时间错误，来讨论梁启超在试图穿行中西纪元、现在与未来时的困难，并对这一作品在中国近代文学史上的位置和意义做出评价。

关键词：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未来；新小说

作者简介：贾立元，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后，清华大学文学博士，主要从事晚清及民国时期科幻小说的研究、中国当代科幻文学批评，同时也从事科幻小说的创作。电子邮箱：xiaoifeidao@163.com

Title: Toward the Future: A New Interpretation to Liang Qichao's *The Future of New China*

Abstract: Through a close reading of *The Future of New China* by Liang Qichao's (1873–1929), an important novel published in 1902, the paper analyzes the way Liang narrates time, which is revealed in the dialogu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ext and its annotations. It argues that the novel is neither a pure narration of the future, nor a mere review of the present, but a constant movement between the two. This fundamental narrative feature of the novel explains why the author made many mistakes, unnoticed in existing scholarship, when dealing with the conversion between the Gregorian calendar and the Chinese calendar, as well as with the transition between the present and the future.

Keywords: Liang Qichao; *The Future of New China*; future; New Fiction

Author: Jia Liyuan is a postdoctoral fellow at the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China). His area of academic specialty is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Chinese science fiction. He is also a fiction writer. Email: xiaoifeidao@163.com

“未来”照进“小说”

1898年，戊戌政变发生，改良派的政治实践惨遭覆灭。梁启超逃往日本。为了排遣他的旅途忧闷，日本军舰舰长把东海柴四郎的政治小说《佳人奇遇》推荐给他。到日本后，梁把这部小说翻译成中文，在其创办的《清议报》上刊载。此后，出于新民的目的，梁启超把日本的政治小说选作中国“小说界革命”的范本，并在1902年创办

的《新小说》上连载自己生平写下的唯一一部小说：《新中国未来记》。

梁启超声称：“余欲著此书，五年于兹矣，顾卒不能成一字。[……]顾确信此类之书，于中国前途，大有裨助，夙夜志此不衰”，但梁因事务繁忙，迟迟无法动笔，最后决定通过报刊连载的方式逼迫自己，“得寸得尺，聊胜于无。《新小说》之出，其发愿专为此编也”（“新中国未来记绪言”51）。

小说开篇就出手不凡，畅想六十年后，中国已

繁荣昌盛,世界各国齐聚首都南京,召开和平会议,此时正赶上中国维新五十周年纪念,上海举办博览会,盛况空前,孔子后人孔觉民老先生为两万名听众讲演过去六十年的中国史。按照作者构想,故事将以十年为一个阶段,到小说发刊之日的“十年后”即1912年,维新成功,广东独立、建设共和立宪政府、与世界各国建交,继而各省独立,形成联邦大共和国,举国同心,国力强盛。接着,以西藏、蒙古主权问题而与俄国开战,联合英美日击败俄国。随后,英美荷兰诸国殖民地虐待华人事件,引发黄白争端。最后有匈牙利人调停,化解战端。可见这是一部从“未来”追忆的“革命往事”,故事的终点处正是小说的起点。^①

这种开场方式不同寻常。《新民丛报》如此解释:“虚构今日以后之事,演出如锦如荼之中国。但发端处最难,盖从今日讲起,景况易涉颓丧,不足以提挈全书也。此回乃作为六十年以后之人追讲六十年间事,起手便叙进化全国之中国。虽寥寥不过千言,而其气象万千,已有凌驾欧美数倍之观”(“中国唯一之文学报《新小说》第一号”广告页)。虽有过誉之嫌,但如夏晓虹所言:“中国文学中从未有过以‘未来记’形式出现的小说,即使偶尔记述对理想社会的构想,也必将其置于同一时代存在的海外异域或与世隔绝的桃花源,而绝没有超越时间阻隔的未来社会提前出现”(“觉世”222)。这自然与对时间和历史的理解有关。不论是分久必合、一治一乱或者六道轮回,古典中国的时间总带有循环的特征,而其憧憬的理想世界,不是已然失落的三代之制,就是时间静止的世外桃源。直到19世纪西学东渐,进化论被视为普世“公理”,铺平了时间无限线性延展的通途,“未来”才能在视野中展开。

因此,以“未来记”形式出现的政治小说先在日本风靡,又经由任公在二十世纪初引入汉语世界,实在意义非凡,难怪历来受到众多论者称赞,确乎值得大书特书。小说开篇即引出新的时间观:

话表孔子降生后二千五百一十三年。【今年二千四百五十三年。】即西历二千零六十二年,【今年二千零二年。】岁次壬寅,正月初一日,正系我中国全国人民举行维新五十年大祝典之日。

(“新中国未来记绪言”53)

邹振环认为:“传统中国的纪年法,无论是王朝年号的纪年还是天干地支的纪年,都是始而复终,终而复始,逝去的王朝像一个个大圆圈,而接替的皇帝也像一个个小圆圈,王朝告终或皇帝死去,纪年即重新开始。它们不像公元纪年法以一个年份将历史截然分成两段,又不断指向未来的直线和屡加迭进的性质”(95)。如此看来,不论是以孔子还是耶稣作为起点,时间都不再于传统的帝王年号中打转,而变成可以无限叠加、持续延伸的,“未来”因此成为可能。这个开篇不无深意,不过,梁启超却犯了个大错误:心里想的明明是六十年后,落笔却成了2062年。由于同时使用了两套纪年系统,生怕当时对西历还很不熟悉的读者弄不清楚,夹批里还特意解释:“今年是两千零二年”。在今天看起来如此奇怪的错误,不但作者本人、当时的排印者和评论者们视而不见,就连后世的梁启超作品编选者和研究者也大多安之若素。^②

实际上,直到民国政府,才开始实行西历,并以运动的方式向民众推广普及,甚至上升到用旧历是反革命的高度。而晚清的各种报刊,经常是阴历和西历时间并列。就梁启超而言,早在1899年从日本启航前往檀香山的旅途日记中,就开始用西历标注时间,这在当时是一种可能被指责为不爱国的行为,因此梁解释说:“且吾今所游者,乃行用西历之地,吾若每日必对翻中历乃录日记,虽此些少之脑筋,吾亦爱惜之也”(“夏威夷游记”1825)。^③可见,即便对梁启超这样学贯中西的大家,要想在两套时间系统自由穿行,也不是一件轻松事儿,这在故事中另一处从未有人注意的错误中也有所体现:“楔子”中说孔觉民“择定每来复一、来复三、来复五日下午一点钟至四点钟为讲期。二月初一日,正是第一次讲演”(“新中国未来记绪言”56)。然而,1962年的旧历二月初一(3月6日)是星期二,2062年的旧历二月初一(3月11日)是星期六,都不该是演讲时间。至于1962年和2062年的2月1日,都尚在“正月初一”大庆典之前,所以也不可能。在不到一千五百字的“楔子”里,作者就犯了两次时间错误,可见在西历和旧历、现在和未来之间的换算,给作者制造了何其大的困难。^④

另一方面,梁启超又是一个有着强烈“世纪情怀”的人。^⑤“世纪”这一来自西方的时间单位背后,蕴含的是一种向前运动、更新和自我实现的“世界历史”观念。汪晖认为:“在19世纪欧洲的历史、哲学、法律、国家和宗教论述中,帝国—国家二元论不仅构成了结构性的对比关系,而且也被纳入到一种时间的目的论之中,从而欧洲‘世界历史’可以被概括为一种以政治形式的演进为基本线索建构起来的时间叙事”(34)。民族主义崛起的“十九世纪”改变了世界格局,冲击了晚清的分子,使他们对“新世纪”产生了种种热望和猜想。在梁启超心中,尽管现实一片疮痍,“新中国”却会在“二十世纪”里复兴强盛,从“老大帝国”蜕变成“少年中国”,在民族国家为主体的世界史中占有重要一席。“二十世纪”歌颂得多了,自然可能不留神把当年想成“二零零二年”,这或许要比“一九零二年”要更为熟悉和得心应手得多。^⑥

“现实”与“未来”的竞赛

可惜,尽管梁启超那其舍我其谁的气魄极大,小说却只勉强写了五回。^⑦两位青年才俊游学归来,意气风发,正准备联络同志开始一番事业,就戛然而止,王德威称之为“一个神秘的时间黑洞”(345)。旧中国如何从“现在”穿越这条时间的黑洞,出落成“未来”的新中国呢?故事中提过:宪政党们人数众多,有一千四百余万,“同声一呼,天子动容,权奸褫魄,便把广东自治的宪法得到了。随后各省纷纷继起,到底做成今日的局面”(“新中国未来记绪言”65)。这种不妨称为“同心协力——如愿以偿”的修辞,即使展开来写,估计也不好看,有敷衍之感,不过在后来受到梁启超影响的众多晚清科幻小说中却颇为常见,而到了鲁迅为代表的“五四”一代,这种轻快的思路已不再有效了。

写作《新中国未来记》期间,正是梁启超一生中立场最为激进的阶段,言辞之间流露出种族革命的排满倾向,并曾一度与孙中山往来甚密,甚至谋划与革命派合并组党,但因惹怒康有为而被迫于1899年赴美组建保皇会,合作之事遂流产。小说的第三回是全书最重要的部分,两个主角,主张平和稳妥改革的黄克强,与主张暴力革命的李去

病,反复辩驳几十个回合,内容几乎涉及后来二十世纪中国所有重大的政治命题,最终却只留下一个“临机应变做去,但非万不得已总不请容易向那破坏一条路走”的调和结论(“新中国未来记第三回”76),充分显露了作者其时内心的矛盾和纠结。

关于小说的虎头蛇尾,同时代的孙宝瑄当时就认定:小说只有符合情理才好看,“演中国之未来,不能不以今日为过渡时代。盖今日时势为未来时势之母也”,然而梁启超明知“今日”时势绝不可能生长出小说中那种“未来”,一定要写成那样,必然不合情理而无法完成(709)。后世学者更以后见之明,给出种种“必然”解释。于润琦认为,既然作者的旨在发表政见,而政见又已发表完毕,小说也就没必要再写下去(111)。夏晓虹分析,根本原因在于梁启超1903年的美洲之行使他看到了民主制度的黑暗面,归来后已彻底放弃革命论,小说自然没法写了(“觉世”69)。王德威对梁启超预设了历史前进的轨道,目的先行地把原本丰富多彩、充满无限可能、值得多方探索的“未来”固定为“已然确定”的单一归宿而感到遗憾:“梁启超对未来的看法,也可能是要完成一个单一的、直线式(却不一定是革命性的)时间发展,它使像梁启超这样的小说家耽于其中,无法进一步想象未来各种不同的方向,以及进化过程本身的变数[……]不妨讽刺地理解为‘新中国没有未来’。没有未来:不只因为小说根本没有完成,也是因为在尝试建立叙述未来的意识形态和概念的模式时,小说包含了对时间展示无限可能的一种根本敌意”(345—46)。

这些说法都有道理,不过笔者认为有必要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做些更深入的分析。这关系到如何看待这部作品的属性。

在同期刊发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梁启超把小说分为“理想派”和“写实派”,前者“导人游于他境界,而变换其常触常受之空气”,后者“摹写其情状[……]和盘托出,彻底而发露之”(“论小说”2—3)。那么他自己的这部“政治小说”到底属于“写实”还是属于“理想”?对此各家也有不同意见。孙宝瑄视其为“乌托邦之别名也,不能不作此想,而断无此事也”(709)。孙楷第却认为,此作“虽系寓言,然自云:‘以发表政见’,则亦为时事而发。且文中所演多指当时事,

与演当代事之讲史书亦有相近之处,今故入讲史目”(63)。

其实,“写实/讲史”与“理想/预言”并非截然对立。夏志清就认为,“理想”必然要包含“未来”,《新中国未来记》便属于“理想”派:“梁启超可能不喜欢‘超自然的人物’(柯立基语),但他的小说世界必然包括外国爱国志士与对未来世界乌托邦式或科学性的预测”(68,78)。夏晓虹也认为,此作兼具政治小说与理想小说的特征:“要改变现实,势必要树立一个理想的典范。作家尽可能运用自己对西方社会、政治制度的了解,权衡利弊,以幻想的形式,将其择优移入中国。晚清中国知识分子的政治热情与对现实的极度不满,便借助‘政治小说’的形式喷发出来”(“觉世”63)。但她同时也认为,作品的未完成影响到对它所选取的“理想小说”样式的估价:“除倒叙开头部分关于1962年的新中国的铺写渲染外,书中对于‘中国近六十年史’的历史叙述,最晚的情节发生在1903年,与小说的创作时间同步。中心事件既未超前进入未来世界,仅凭短短的一个开头,是无法断定这部理想小说的创作能否成功的”(“觉世”68)。^⑧

的确,粗眼一看,除了开篇,小说全无“未来”。不过,前三回的正文,在形式上存在双重叙事者:身在1962年的孔觉民和聆听他讲演的记录员。正文之外的眉批和夹批,则保持与1902年的读者处于同一时空。正文与批注之间构成了“未来”与“现在”之间有趣的对话关系。例如,第一回中,当正文说孔觉民“今年已经七十六岁”,夹批则补充:“先生今年十六岁了”;第二回中,听众在正文中恭候孔觉民演讲,夹批则说:“我却候了六十年”;之后,孔觉民讲到:“现今各处图书馆,岂不是都有那洋装六十太厚册名字叫做《今鉴》的一部书吗?到现在时过境迁,这部书自然没甚用处,亦没多人去研究他”,夹批则说:“我尚急欲一看”;正文又说:“还记得那时老夫正在日本东京留学”,夹批说:“原来老先生却在这里,明日定要奉访领教”(“新中国未来记绪言”55、57、72—73、74)。可见,批注在作者与读者之间架起桥梁,帮助彼时对未来叙事相当陌生的读者进行时空转换,并起到一定的幽默效果。因此,笔者认为,不是单纯的想象“未来”或评议“现在”,而是叙事在两者之间不停地运动,构成了这一作品根

本性的时间特征。

意识到这一点,就可以进一步注意到文中两处非常重要但此前一直被人忽视的细节。小说第三回发表于1902年12月的《新小说》第二号,其中写到两位主人公游学归来,“直到光绪壬寅年年底,便从俄罗斯圣彼得堡搭火车返国”,夹批称:“两君现在谅来已经动身了,我们预备开欢迎会罢”,而“到了明年癸卯,暮春初夏的时节,这两位早已来到山海关了。”这是开篇之后故事时间又一次进入“未来”,即1903年春。可惜,二人在此只是进行了一次冗长的论辩(“新中国未来记第三回”33、34)。到了第四回(《新小说》第三号),二人在“三月廿八日礼拜六”到达旅顺(“新中国未来记第四回”42),故事时间尚且保持在“未来”,^⑨可是人物所谈论的不过是现实中发生不久的时事,并且仿佛生怕读者认为自己凭空虚造,“著者案”强调:“以上所记各近事,皆从日本各报纸中搜来,无一字杜撰,读者鉴之”(“新中国未来记第四回”53)。《新民丛报》上的广告亦宣称:“第四回[……]内中所言事实,乃合十数种之报、数种之书而熔铸之者,以数日之功,搜辑材料,煞费苦心。读之如欲觉闻钟,发人深省”(“《新小说》第三号要目”14—5)。到了实际刊发于1904年1月以后的第五回,一度超前的故事时间再次落后于现实时间,一闪而过的“未来”被真实的历史进程追赶并抛在身后。^⑩

看得出来,梁启超原本有心在正文里演义一出“虚构之未来”的戏目,故事的重心却一再落回到“真实之今日”,部分原因则在一条眉批有所透露:“此种近事,随处补叙,故读一书便胜如读数十种书。处处拿些常识教给我们,《小说报》之擅长,正在此点”(“新中国未来记第四回”58)。正如夏晓虹指出的:“小说前三回,梁启超还注意到让孔觉民和速记员同时出场,而到第四回,大约觉得这样写太麻烦,有成为老套子之嫌,于是打发两位叙述人一齐隐退。并且,讲演词这时也变成了著述稿,由作者代替二人直接叙事,‘听众’也就被‘看官’所取代。随着双重叙事解构的消失,由主要叙述人孔觉民所造成的叙事限制因而取消”(“觉世”68)。实际上,同时消失的还有那个“未来”与“现在”的时间运动,叙事也就真的成了“老套子”了。

这种在叙事上跟“未来”的纠缠和决裂,造成

了多处时间混乱。在第五回中,黄克强对新登场的郑伯才说,自己与李去病的论辩“都登在《新小说》的第二号,谅来老先生已经看过”(“新中国未来记第五回”49)。此前我们已知道,黄、李二人的辩论发生于1903年的春末,由1962年的孔觉民口中道出,并由速记员记录成文,寄给《新小说》报社。问题在于:速记员用了什么方法,才能穿越“时间的黑洞”,将稿件寄给1902年的《新小说》报社,以便让郑伯才看见呢?身为书中人物的黄、李,对于自己的谈话尚未发生就已公开发表,又何以安之若素?在这段“出戏”式的写法之后,另一位人物杨子芦介绍官运亨通的秘诀:“最低的本事,也要巴结得上荣中堂”,批注称:“那时荣禄未死”(“新中国未来记第五回”56)。实际上,1903年4月11日,荣禄去世。28日,东京各报详细报道所谓“中俄密约”。29日,留日学生集会拒俄。而第五回开头已讲到,黄、李二人回到京时正好听说留日学生集会拒俄之事,之后又急奔上海,在这里遇到的人,怎么可能还说要巴结荣禄?凡此种种,都表明作者在初次尝试未来叙事时的种种生涩与艰难。

在梁启超诸多惊人的庞大写作计划中,还有《新中国未来记》的两个姊妹篇:《旧中国未来记》,写中国如不维新将会遭受的国破家亡,最终不得不革命,这算是反写;《新桃源》,写二百年前出逃海外的一批中国人在荒岛上建立文明国度,并在后来支援大陆同胞维新大业,这算是补写(新小说报社,“中国唯一”广告页)。如此构想,不正恰好说明,一直以思想不断变化著称的梁启超,或是无法、或是不愿把“未来”纳入到一个既定的轨道上吗?哪怕在当时他确信由“新”国民而通往民族国家的新中国是必然趋势,也仍对通往这一前景的历史运动方式感到难以把握:“非信其必可行也。国家人群,皆为有机体之物,其现象日日变化,虽有管葛,亦不能以今年料明年之事,况于数十年后乎!况末学寡识如余者乎!但提出种种问题一研究之,广征海内达人意见,未始无小补,区区之意,实在于是”(“新中国未来记绪言”51)。

总之,不论是有意还是无意,偶然还是必然,除第一幕的远景外,梁启超都一直不能/不想/不敢超前“现在”太多,展开些许不寻常的“未来”想象,他几乎只能等待着“未来”一点点沦为“过

去”,然后以和现实时间同步的姿态将其记录而已。果然如此,照着“月出一册,册仅数回”的速度(“新中国未来记绪言”52),就算能坚持下去,估计说不定真要写到现实中的1962年才能收尾,于是也就变成“中国现在记”了。这也是作品无法完成的又一深层原因吧。

穿越黑洞之旅并不轻松。孔老先生的演讲戛然而止,虚拟时空的人们永远地失去了“历史记忆”。虽如此,这部未竟之作却打开了一扇窗,窗外透出了远山的风景,尽管通往那里道阻且长,无数后来者却决意启程。任公骑着“小说”这匹快马,哪怕无法追上“未来”,时间却开始了。

结语

尽管明显受到日本“政治小说”的影响,尽管没有涉及任何超越现实的想象,叙事时间也总在“现在”与“未来”间挣扎,《新中国未来记》仍然是一个新的作品。它处处投射着新的公理世界观、世界历史中的民族竞争图景与进步观,并开启了一个基本的方向和想象路径。此后直到民国,光是在题目含有“未来”字样的小说就有数十种,其中的不少也同样是怀揣雄心出发,想要去往“未来”却很快搁浅。比如,“悔学子”的《未来教育史》,似乎要写理想中的未来新教育,结果写了四回沉闷的现实便不了了之。又如,萧然郁生的《乌托邦游记》,声称要带主人公前往“乌托邦”,可惜还未抵达,就再无下文。而梁氏在故事中涉及的黄白种族大战、纪元争论、乌托邦畅想、少年强则国强的路径等等,都在后来的《新纪元》《电世界》《新中国》《新石头记》《新野叟曝言》等晚清科幻小说中获得了展开。

总之,它更像是一个由梁氏写下“草稿”,后来者纷纷参与修正、改写、续写而始终未能完成“定稿”的大文本,或元文本。

当然,使它有别于之前更早的、在情节中引入大量西洋军事科技发明的《荡寇志》(1851)等作品的,依然是它那明晰的“未来主义”,那背后是一整个时代的观念巨变:

公理世界观逆转了天理世界观的历史观,将未来而不是过去视为理想政治和道德实现的根源。这一逆转瓦解了儒

学世界观内部所包含的历史中断或断裂的意识,以及由这一意识而产生的接续道统的意志,代之以一种历史延续和无穷进化的意识,以及由这一意识而产生的与过去决裂的意志。在这一历史意识的支配下,不是以个人的道德/政治事件重构造德谱系,而是以一种投身未来事业的方式体现历史意志,构成了新的伦理。(汪晖 48)

这就是所谓的“现代”。

注释[Notes]

- ① 这一情节构想出现于《新民丛报》所做的广告中,梁启超实际并未完成。见新小说报社:“中国唯一之文学报《新小说》”,载《新民丛报》14(1902):广告页。
- ② 夏晓虹、赵毅衡等人曾指出这一错误。夏晓虹以“梁启超多加了一百年”一笔带过(“觉世”42)。赵毅衡则认为:“未来小说是从未来倒推叙述成为已然的未来,而不是纯然的预言。这个并不复杂的时间圈,会把初试者搞糊涂[……]梁启超不仅搞错了西历,甚至弄错了康梁派力主采用的‘孔子纪元’”(“二十世纪”103)。从未来倒叙的形式确实让写作者迷乱,但赵未深究背后更根本的是则中西两种时间系统交错的麻烦。此外,梁启超并未搞错孔子纪元的时间。
- ③ 关于近代的历法、纪年等时间问题,还可参见湛晓白:《时间的社会文化史——近代中国时间制度与观念变迁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
- ④ 关于这个错误,笔者推测:梁启超是以1902年的二月初一(3月10日)星期一为准,认为一个甲子后的二月初一仍然是周一。不过,到了小说第三回的结尾,速记员在记录完孔觉民的第二次演讲后,却又说下一次演讲要等到“礼拜六”(“新中国未来记第三回”,78),似乎作者已经忘了此前设定的演讲时间了。
- ⑤ 有关梁启超的“世纪情怀”,见闻小波:“梁启超的世纪情怀”,《二十一世纪》2(1999):25—31。
- ⑥ 有关梁启超何以会犯这个错误,笔者曾当面向夏晓虹先生请教,她推测与“二十世纪”这一概念在当时的流行有关。
- ⑦ 第五回是《新小说》杂志上唯一一篇未署作者名的小说,曾有人将这一点作为证据之一认为此回并非梁启超所做,但根据夏晓虹的考辨,现有的怀疑都证据不足,本文采纳夏的观点,认同第五回的作者是梁启超。参见夏晓虹:《谁是〈新中国未来记〉第五回的作者》,《阅读梁启超》(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296—303。

⑧ 本文中的所有着重号皆为笔者所加。

⑨ 1903年2月14日,上海《游戏报》就已经出现《新小说》第三号到货的广告,见陈大康:《中国近代小说编年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570。梁氏的故事却已进展到3月28日之后,属于“未来”。

⑩ 《新中国未来记》第五回载于《新小说》第7号,出刊时间标为1903年9月,但据夏晓虹考证,实际出刊时间当为1904年1月17日以后(“谁是”,299)。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 “中国唯一之文学报《新小说》第一号要目预告”,载《新民丛报》17(1902):广告页。
- [“Advance Notice of Main Contents of the First Issue of the Only Literary Journal in China: New Fiction.” *Xinmin Congbao Papers* 17 (1902): Advertisement.]
- 陈大康:《中国近代小说编年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
- [Chen, Dakang. *Chronicles of Modern Chinese Novels*. Beijing: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2014.]
- 赵毅衡:“中国的未来小说”,《花城》1(2000):194—207。
- [Zhao, Henry Y. H. . “The Novel of the Future in China.” *Flower City* 1(2000): 194—207.]
- :“二十世纪中国的未来小说”,《二十一世纪》6(1999):103—12。
- [——. “The Novel of the Future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 *Twenty-First Century* 6(1999): 103—12.]
- 夏志清:“新小说的提倡者:严复与梁启超”《人的文学》。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
- [Hsia, Chih-tsing. “Yen Fu and Liang Ch'i-ch'ao as Advocates of New Fiction.” *Humane Literature*. Shenyang: Liaoning Education Press, 1998.]
- 梁启超:“夏威夷游记”,《饮冰室文集点校》,吴松等点校。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
- [Liang, Qichao. “Journey to Hawaii.” *Annotated Collected Works of the Ice-Drinking Studio*. Eds. Wu Song, et al. Kunming: Yunnan Education Press, 2001.]
- :“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新小说》1(1902):1—9。
- [——.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iction and the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 *New Fiction* 1 (1902): 1—9.]
- :“新中国未来记绪言、第一、二回”,《新小说》1(1902):51—75。
- [——. “The Future of New China: Preface and the First Two Chapters.” *New Fiction* 1(1902): 51—75.]
- :“新中国未来记第三回”,《新小说》2(1902):29—79。
- [——. “The Future of New China: Chapter 3.” *New Fiction*

- 2(1902): 29-79.]
- : “新中国未来记第四回”,《新小说》3(1902): 41-68。
- [——. “The Future of New China: Chapter 4.” *New Fiction* 3(1903): 41-68.]
- : “新中国未来记第五回”,《新小说》7(?): 27-60。
- [——. “The Future of New China: Chapter 5.” *New Fiction* 7(?): 27-60.]
- 闻小波: “梁启超的世纪情怀”,《二十一世纪》2(1999): 25-31。
- [Lv, Xiaobo. “Liang Qichao’s Century Complex”. *Twenty-First Century* 2(1999): 25-31.]
- “《新小说》第三号要目”,《新民丛报》第24号,第14-15页。
- [“Main Contents of the Third Issue of *New Fiction*”. *Xinmin Congbao Papers* 24(1903): 14-15.]
- 新小说报社: “中国唯一之文学报《新小说》”,载《新民丛报》14(1902): 广告页。
- [New Fiction Press. “The Only Literary Journal in China: New Fiction.” *Xinmin Congbao Papers* 14(1902): advertisement.]
- 孙宝瑄: 《忘山庐日记》上册。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年。
- [Sun, Baoxuan. *Dairy of Hut Wangshan*. Vol. 1. Shanghai: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Company, 1983.]
- 孙楷第: 《中国通俗小说书目(外二种)》。北京: 中华书局, 2012年。
- [Sun, Kaidi. *Catalogue of Chinese Popular Novels (and Two Other Works)*.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2012.]
- 王德威: 《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宋伟杰译。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年。
- [Wang, David. *Fin-de-Siècle Splendor: Repressed Modernity of Late Qing Fiction, 1849-1911*. Trans. Song Weijie.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05.]
- 汪晖: 《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上卷·第一部)。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8年。
- [Wang, Hui. *The Rise of Modern Chinese Thought*. Vol. 1. Part I. Beij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2008.]
- 夏晓虹: 《觉世与传世——梁启超的文学道路》。北京: 中华书局, 2006年。
- [Xia Xiaohong. *Enlightenment and Legacy: Liang Qichao’s Literary Path*.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2006.]
- : “谁是《新中国未来记》第五回的作者”,《阅读梁启超》。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8年。 296-303。
- [——. “Who is the Author of Chapter Five of *The Future of New China*”. *Reading Liang Qichao*. Beij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2008. 296-303.]
- 于润琦: “《新小说》与清末的‘政治小说’”,《明清小说研究》4(2004): 108-20。
- [Yu, Yunqi. “New Fiction and ‘Political Novels’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Journal of Ming-Qing Fiction Studies* 4(2003): 108-20.]
- 湛晓白: 《时间的社会文化史——近代中国时间制度与观念变迁研究》。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3年。
- [Zhan, Xiaobai. *The Sociocultural History of Time: a Study of Changes in Time Systems and Concepts in Modern China*. Beijing: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2013.]
- 邹振环: “《四裔编年表》与晚清中西时间观念的交融”,《近代史研究》5(2008): 89-97。
- [Zou, Zhenhuan. “The Book of Dates and the Blending of Chinese and Western Ideas about Time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Modern Chinese History Studies* 5(2008): 89-97.]

(责任编辑: 王 峰)